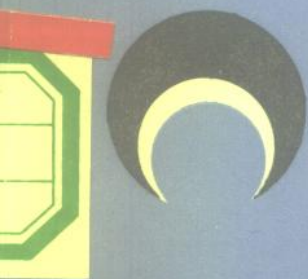


科学攀登的历程

评介于光远

《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1~5 卷)》

齐翔延 编



人民出版社

科学攀登的历程

评介于光远

《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1—5卷)》

齐翔延 编

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科学攀登的历程/齐翔延编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1

ISBN 7-01-002090-6

I. 科...

II. 齐...

III.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评论-文集

IV. F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4) 第 12823 号

科学攀登的历程

KE XUE PAN DENG DE LI CHENG

齐翔延 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1995 年 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 月北京 1 第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25

字数: 268 千字 印数: 1—1500 册

ISBN 7-01-002090-6/F·466 定价: 12.00 元

目 录

为编辑出版《科学攀登的历程》一书而写·····	于光远	1
研究初级阶段理论贵在创新·····	董辅初	6
——读于光远著《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		
《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一文读后·····	汪海波	15
——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若干问题		
我国社会发展阶段理论研究的新成果·····	孙连成	30
于光远同志50年代对社会主义商品、价值、		
价格理论的重要贡献·····	张卓元	40
对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探索·····	李定中	48
——读《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札记		
经济学百花园中的奇葩·····	张友仁 何国前	55
——于光远同志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若干问题的探索		
*		
所有制辨析·····	林子力	74
关于社会所有制范畴·····	唐宗焜	82
对社会所有制的探索·····	何 伟	108
——学习光远同志《探索》(五)的体会		
一个意味深长的改革命题·····	唐丰义	128
——学习光远同志关于社会所有制的观点		
智慧的痛苦·····	熊映梧 苏东斌	143
——读光远的《探索》有感		

光远同志在所有制问题研究上的贡献·····	晓 亮	153
探索改革新路的理论启示·····	上 进	165

——于光远同志间国有制理论的现实意义

*

简评于光远的按劳分配思想·····	张问敏	176
平均主义·按劳分配·劳动力商品及其他·····	冯兰瑞	186

——读《社会主义和它的初级阶段中消费品的分配原则》

*

改革理论研究的开拓者·····	冒天启	196
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政治经济学武器·····	曾牧野 李新家	207

——读于光远《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五)

坚持对外开放的若干问题·····	方 生	216
------------------	-----	-----

*

读《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	王惠德	224
《探索》是具有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的学术专著·····	吴光辉	239
读《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中》·····	蒋映光	252
探索时代的真理·····	林京耀	261
加法与减法·····	忠 东	266

*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官员·····	吴 象	271
对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理论体系和方法		

的可贵探索·····	张朝尊 李克明	274
------------	---------	-----

把崇高的价值观同实验科学的求实态度结合起来·····	吴敬琏	298
确实要解决研究社会主义的方法论问题·····	周叔莲	302

——学习于光远有关论著的札记

认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方法论·····	齐翔延	309
----------------------	-----	-----

一个全新的研究角度.....李成勋 325

——“小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评析

附录一：青松寒不落 碧海阔逾澄.....齐翔延 335

——我所认识的于光远

附录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1—5卷)目录..... 347

为编辑出版《科学攀登的历程》一书而写

于光远

1952年11月，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译本出版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我决定改变原有的计划，不再把研究土地问题而把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建立这个学科作为自己的主要的努力方向。这是1953年的事，到现在整整40年。

1956年起我开始发表自己在这方面有独立见解的文章。在写了10篇这样的文章之后，1958年出了一本集子，用的便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1958年后到1966年又写了8篇。接着，从1966年到1976年，我没有可能从事任何写作，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7年，才恢复这方面的研究。1980年我就把1966年前写的18篇文章仍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为书名，编成第一卷，并把1977年的文章编入第二卷。第一卷在当年12月初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二卷则在1981年7月出版。“文革”前，在50年代和60年代，我两次接受组织交给我的任务，编写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科书，两次组织了编写组。在工作中深感这门学科还很不成熟，编写教科书还不是时候，只能在这个方向上做些探索工作。于是文章一篇一篇地写，从第二卷出版后，每隔几年待这样的文章积累到一定的数量后就编一卷，由人民出版社出一卷。1985年10月出第三卷，1988年9月出第四卷，1991年出第五卷，到现在

为止已经出了五卷，共211万字。第六卷将编入1989年5月以后写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收入这多卷本文集中的文章，限于直接同这个学科建设有关的文字，其他经济学方面的文章我另外出了些书和集子。如关于改革，有《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关于战略有《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战略学与地区战略》、《论地区发展战略》，关于计划工作有《讲一点理论，提一点建议》等，它们当然也以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理论为基础，但毕竟不是直接同这个学科建设有关的，因而这类文章都不收入《探索》一书之中。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在1988年我写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和《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本来从体例上看是不应该编入的，只是因为原先已决定以单行本的形式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可是1989年后湖南人民出版社被撤销，这本书稿也就退回到我这里。这时候《探索》（五）正好集稿，我就把它也编进去了。

已经出版的五卷是我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这个领域中探索的足迹。在这200多万字的文章中，我提出不少自己的“新”的观点，作了某些新的论证和论辩。同时在这漫长的40年中，我的思想不断进步，早一点时候提出的观点，过一个时期也许就改变了。我不愿意让自己的研究异化成为束缚我、统治我的力量。凡是我写出的东西，我就把它作为自己批判的对象。我在不断“更新”自己的认识。因此我对别人从科学上对我的观点进行批评，不但不介意，而且真诚地欢迎。我相信这种批评，可以使我的正确的观点经过考验更站得住脚，而对那些站不住脚的观点否定得更坚决。

这五卷《探索》的出版，在我国经济学界是产生了影响的，但是我很不满足。我不是怕批评，而是感到文章中提出的观点得不到我希望的反响。

比方说，在1956年我就对斯大林提出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提出异议，我认为有计划和按比例不是一回事，社会主义制度的规律可表达为“有计划地按比例发展的规律”。这篇文章收入第一卷，后来我的观点几度变化，从“有计划地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到“有计划地发展的规律”到“社会主义计划性的规律”，可是直到现在，人们还在讲“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而不讲为什么还要肯定这个规律的道理。

又比方说，我在1980年2月就正式提出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改回“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前面这样一种译法是我在1958年提出的，很快就被党中央所采纳。不到半年，我认为这种译法已经引起了误解，因此我一直主张改回去。我在《探索》（二）中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角度讲了应该改回去的道理，可是直到现在，还是在用我提出的那个不好的译法，也没有讲出不应改回的道理。

又比方说，据我查证，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他们是严格区分“公有”和“社会所有”这两个词的。英文、俄文的译文也都作了区分，唯独中译文把两个不同的德文字译成同一个中文词“公有”。我认为翻译应该忠实于原文。如把马恩在一个自然段，甚至一句话中使用不同的两个词的地方译成同一个中文词，这种作法应该说是不得的，同时这种误译也不利于区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公有制与其他社会制度下的公有制。为此在《探索》（五）中我写了一篇《马恩严格区分“公有”和“社会所有”，不应都译成“公有”——一个在理论上具有重要性质的翻译问题》。对这篇文章我也没有见到有什么反响。

至于我在1986年提出的“市场经济主体论”，和对“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这种看法的不恰当进行专门的论述，以及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等等，

也早已收入1988年出版的《探索》(四)中,但在1992年以前也几乎不为人知。

这样的事太多了。在这多卷本的《探索》中,我提出的新见解很多,我想列一张表,可是这个工作还来不及做。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我想有两条:第一条也许是主要的。现在在中国,我说的那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冷淡主义”继续在发展。我在《探索》中写的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是属于该冷淡的一个领域。过去要求群众都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我觉得这种要求太高了,但现在连搞理论的人对它们的冷淡也在发展,我认为是个问题。还有一些“左”的理论家,他们对于进行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毫无兴趣。他们的兴趣只在挥舞“左”的棍子上。这不是一般的冷淡。当然有一种情况是不属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冷淡主义”的,那就是大家都很忙,没有时间去看别人写的东西,特别是长的理论文章。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情况,因此我也不应对别人有过高的希望。在我提出的那些观点中,某人能对其中某一个或某几个观点给以注意,我就可以满足了。

我的一些观点不被人知或没有受到我所希望的重视,还有一个具体原因,那就是这部书出版了,但是人们买不到它。我了解一下,手边有全套这部书的经济学工作者很少,经济院校、经济研究机构的图书馆、资料室也几乎没有全套的这部书。看不到这部书,那么当然无从作出反响了。此外我国书评工作做得不那么好也是一个原因。

我考虑了这些原因,同人民出版社商量,希望重印《探索》一到五卷,设法满足理论工作者、经济学工作者的要求(包括到图书馆、资料室里能够阅读到这本书的要求)。我希望书中的某些比较重要的观点能够引起比较多的人注意,引起较多的讨论。

人民出版社决定出一本我国经济学家评论一至五卷《探索》的

书籍，定名为《科学攀登的历程——评介于光远〈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1—5卷》。本来我打算也写一篇自我评论这五卷的长文，因为这篇文章迟迟没有写出来，使这本书的出版时间也被耽误了。现在想，在这本书中应该让别的经济学家多写些，我的自我评价可以另外写，另外发表，可收入《探索》（六）或者《探索》（七）中，而不在这本书中放进这篇文章。

研究初级阶段理论贵在创新

——读于光远著《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

董 辅 初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是我国理论工作者重点研究的一项课题，迄今已陆续发表和出版了一些有关论著。最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于光远同志的新著《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一书，就是一本系统地论述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也涉及教育、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专著。

这本书虽然以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为研究对象，但内容广博，涉及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理论。由于作者学识渊博，思想敏锐活跃，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素养，本书的许多论述具有开创性，富有独到的见解，能给读者以许多启迪。本书篇幅巨大（33万字左右），不可能在这篇短短的读后感中，将其精辟的观点向读者作详细介绍。这里，我只能简单地谈几点读后所获得的深刻印象。这些印象，也可以说是本书的一些特点。

●首要问题是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过去的某些译法和误解，应重新探讨。

提出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再认识后得出的结论，对社会主义再认识必定要求正确处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在这本书中，作者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

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他说,这些基本原理不应怀疑,不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范围之内。

不仅如此,作者还探讨了多年来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方面的一些译法和误解。例如,作者认为,把“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更高的阶段”译为“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使人们长期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只有“低级阶段”与“高级阶段”两个阶段。他的看法,“高级阶段”应译为“一个更高的阶段”,在这个更高的阶段以后还会有若干比这更高的阶段,而在每个大的阶段中都会有若干小的阶段。比如,我国的社会主义在发展中就有一个初级阶段,而后者又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作者划分为至少三个阶段,即起始阶段、改革阶段和新体制相对稳定阶段)。我们过去在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错误,就同对共产主义的阶段划分的认识错误有关。“高级阶段”的译法既会使人们误解为其后不会有更高的阶段,也会使人们认为“高级阶段”以前只有一个阶段即“低级阶段”,我国已经处于这个“低级阶段”并且向着“高级阶段”过渡。“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论断的提出才纠正了这种错误。

又如,作者提出在社会主义所有制方面不能将“社会所有”译为“公有”,从而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本性质,它要以某些社会主义所有制作为自己的形式,社会所有不等同于公共所有。不同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具有不同的社会所有制的成分。把“公共所有”与“社会所有”都译成“公有”会使人们对社会主义所有制产生许多误解。例如,把社会所有制作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诸形式中的一种。作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同时,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对以往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观念和论断作出重新的判断,这对于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异常重要的。作者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研究包括两个基本方面,即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和对建国

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作出正确的估量。本书提出的许多新观点，都是作者对社会主义再认识后形成的。例如，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特征进行再认识后，作者将列宁的著名公式“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按劳分配”改为“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按劳分配+社会主义商品关系）”。这括号中并为一项的二点则是社会主义第一阶段特有的。

●对自发性要具体分析，不应不加区别地排斥自发性。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应关系，不是一一对应而是一多对应或多一对应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必定会遇到一系列哲学问题，要求从哲学的高度作出透晰的解答。由于作者既是经济学家又是哲学家，这本著作同作者的其他著作一样，对经济问题的论述往往富有哲理性。不仅使人们读后视野开阔，思想深化，并且常能引导人们去进一步思考。作者在论述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关系问题时，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自发性问题。众所周知，在以往的一些哲学和经济学著作中否定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自发性，都把自发性看成是有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与此不同，作者指出，计划调节是自觉的，市场调节则有不同情况。一种情况是市场调节作用本身是国家领导和管理的派生物，即国家运用经济杠杆通过市场机制来达到预期的目的，这样的市场调节不是自发的东西。另一种情况是市场调节作用或多或少是自发的。这种自发的调节作用如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方向一致就起着积极作用，否则起着消极作用。社会管理中心的领导管理，应该是支持积极的自发作用，限制消极的自发作用，领导与管理应该以群众自发的积极行动为基础，要善于提高，善于引导。因此，不能一味地不加区别地排斥自发性。

作者在论述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的对应关系时，也从哲

学的高度提出一一对应和一多或多一对应问题。作者认为，把它们之间的对应看作是一一对应是一种机械论。二者的对应是一多对应即一种生产力可以有多种生产关系与其相对应；多一对应，即多种生产力可以与一种生产关系相对应。作者对此作了具体分析。认识到二者在对应中的复杂性和弹性，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不能用形式单调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去对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极其复杂的生产力水平的差异状况，极有可能是极其复杂的生产力与多种多样的社会生产关系相对应，其中既有社会主义的也有非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二者中又各自具有不同的具体形式。作者的这种论证，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多种所有制问题，从哲学上提供了立论的依据。

●要区分现存的东西和现实(必然)的东西，从对现存东西的研究中去揭示现实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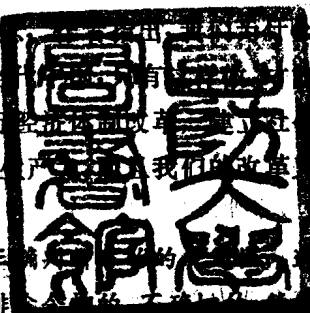
过去我们在社会主义研究中之所以发生重大失误，往往是由于不是从现存的实际出发，而是从某种预定的条条框框、概念结论出发，方法论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因此，在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时，作者注意从哲学高度上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表现出他对研究社会主义的方法论给予了特殊的重视。本书有专门一章谈方法论问题。作者提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方法，对于我们研究当代社会主义和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是有重大指导意义的。我们要在研究中学学习和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工具。作者缜练地运用哲学工具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说：我们今天仍然应该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为世界阐发新原理。我们要坚持从现存的实际出发来发展社会主义的科学，避免用未经这种研究而预先设置的框框、模式、标准等来束缚对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作者提出，在研究当代社

会主义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问题时，“要对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的一切不合理的东西和弊端进行无情的批判”，“要在批判与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点不相适应的体制中发现新体制”。而“批判”则是指客观地分析和研究而非简单地否定，同时要靠我们自己的创造来分析新时代出现的新情况，提出解决问题的新途径并概括出新的概念、新的提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概念的提出就是党的创造性研究的成果。从这种认识出发，作者对现存和现实这两个概念作了独特的研究。作者指出：“马克思主义科学研究的任务是既要研究现存的东西，又要研究现实的东西，要从对现存的东西的研究中去揭示现实的东西”。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来说，社会主义社会还不是现存的东西，他们只能研究社会主义的现实性，当然也就不可能讲得很具体。我们则有可能而且应该对现存事物进行分析，看它的存在是否在某种条件下具有现实性。为此我们就要在理论上继续作批判工作，区别现存的东西与现实的东西。这样的分析，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创立以及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生产力状况是制约社会主义自身发展的成熟程度的最重要因素，也是制约社会主义社会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演进的最主要因素，坚持“生产力标准”与坚持“社会主义标准”是统一的。

以往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屡犯“左”的错误，在于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的一元主义，把阶级斗争作为一切工作的纲。在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一些人对“社会主义阶段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以及“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该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不能透彻理解，往往把“社会主义标准”或其他标准与生产力标准平列起来，

甚至凌驾于生产力标准之上。关于生产力的一元主义在本书中有详细的论述。作者指出：“生产力发展状况是制约社会主义自身发展的成熟程度的最重要因素，也是制约社会主义社会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演进的最重要因素。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之所以处在‘初级阶段’，其根本原因是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如果说社会主义阶段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任务就更具有紧迫性。本书用了相当大的篇幅分析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并且在本书的各个部分都贯穿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原则。针对有人怀疑只讲“生产力标准”不讲“社会主义标准”是否妥当的糊涂观



，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因为在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保证生产力的发展。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就是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的改革必须与生产力的实际发展状况相适应。

●确切的概念是正确认识的必要前提，也是进行科学分析研究的前提。要排除含糊的、不确切的、笼统的概念，提出科学的新概念。

过去在社会主义研究中，常常抓住一些概念想当然地加以发挥，如从“资产阶级权利”引申出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这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研究中需要切实避免的。作者在分析中十分注意概念的确切性，并且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概念，使我们对事物的认识细化了，深化了，排除了含糊的、不确切的、笼统的概念所带来的理论上的混乱。例如，针对以往人们认为企业中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企业的经营大权就应由国家掌握的错误看法，作者对所有和经营、所有和占有的区别作了详细的论述。对于占有，作者又区分为使用中的占有和非使用中的占有，经营中的占有和所有中的占有，经营则又区分为一般的经营和以‘财产’为对象的经营；